

新发展阶段国内外双循环互动模式的构建策略

魏婕 任保平¹

【摘要】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虽然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参与和依赖传统国际大循环实现了“增长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价值链攀升效应”，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全球竞争力提升；但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世界格局日趋错综复杂，外部环境在发生剧烈变化，“三重效应”均呈现边际递减的态势，传统参与国际循环的模式面临诸多挑战，也面临着转型和改变。新时代中国应从“内外兼修联动、供需两端发力、改革畅通双循环”的视角和思路构建国内外双循环互动发展模式。

【关键词】 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543 (2021) 06-0072-11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根据中国发展阶段、要素禀赋条件变化以及世界大局巨变作出的战略决策。中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需要以一种全新的身份、全新的发展思路、全新的发展理念来顺应全球化潮流，实现自身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绩效评价

1949—1977 年，中国实施的是较为封闭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基本方针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参与国际间循环较为有限。直到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才真正拉开了中国参与国际循环、融入世界市场的序幕。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采取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渐进开放策略逐步扩大开放，以一个学习者身份融入国际循环，并成长为一个引领者参与全球治理，造就了难以复制的“中国奇迹”。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中国经济经历了从主要依靠国内循环、到逐步深度融入国际循环、再到国内国际循环相对平衡的过程。在这一复杂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中国参与国际循环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绩效，主要产生了三种效应。

（一）增长效应：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助力“中国增长奇迹”形成

1987 年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向中央提出《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该构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思路，这一构想促成了“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真正意义上参加国际循环以此为开端。1978—2019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速度达 17.3%，对外贸易增长迅速（见图 1）；2019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 31.54 万亿元。

1978 年，中国贸易依存度仅为 9.7%，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分别为 4.6%和 5.1%（见图 2），经济基本处于封闭状态。此后，中国开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逐步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反映国外市场对中国需求的出口依存度持续上升，2019 年达到 17.4%。出口依存度在 2006 年达到最高值之后保持稳定。

作者简介：魏婕，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任保平，西安财经大学副校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与协同推进研究”（21ZDA066）

直观反映中国对国外需求的进口依存度，与出口依存度变动态势基本类似，总体上中国的出口依存度高于进口依存度。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均经历了由低到高再趋于稳定的过程，且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保持较高的水平^[1]，这均表明中国的外贸与增长关系密切，参与国外循环在长期的高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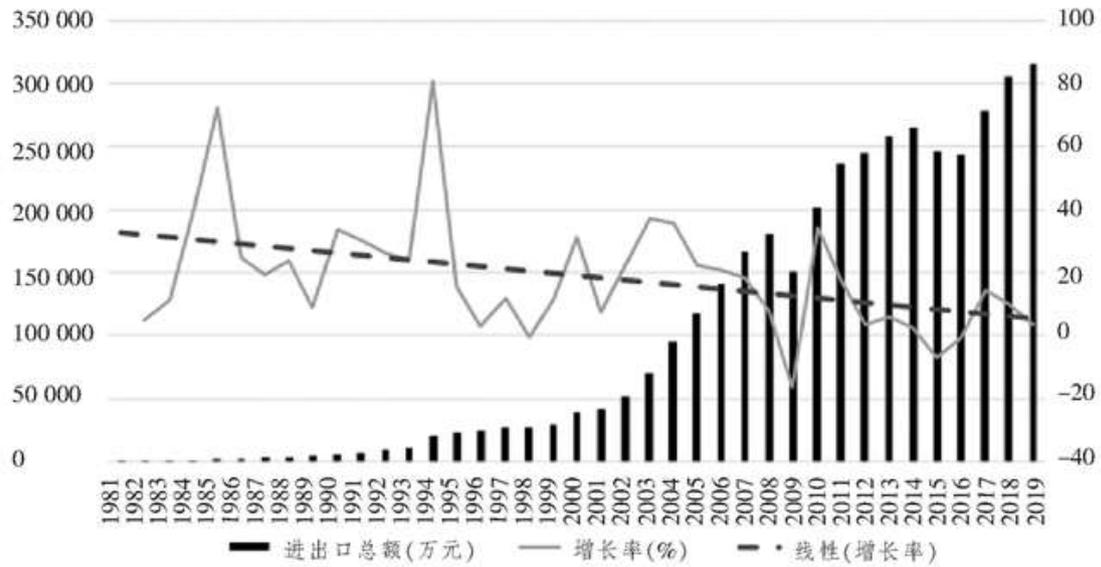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率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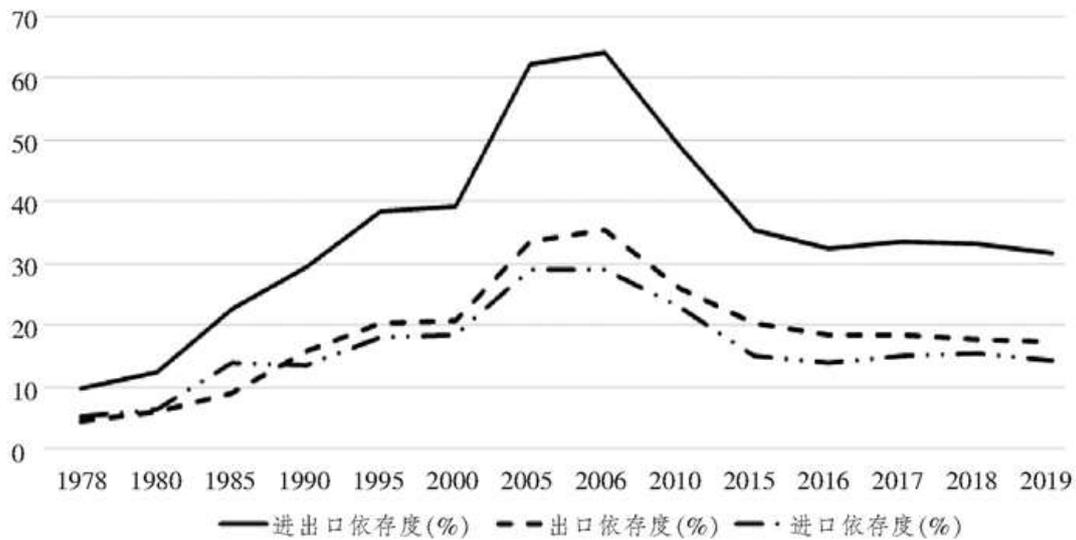


图2 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参与国际循环，还表现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上。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持续增长（见图3），累计吸收FDI2.1万亿美元；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外投资呈爆发式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

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比重不足 1%，跃升至 2013 年超过 1000 亿美元，2016 年中国更是达到 1961 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根据《世界投资报告 2020》计算，2019 年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均占世界的 9%，吸引外资占整个发展中国家的 20.6%，而对外投资则占发展中国家的 31%。

由此可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开放领域的主要指标均与 GDP 同向演变，开放领域主要指标的增长均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1978—2019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均为 14%；1990—2019 年对外投资年均增长率为 12.8%，高于 9.4% 的 GDP 年均增长率。由此可见，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对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1]。在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的过程中，中国成为全球经济表现最好的经济体之一。参与国际大循环产生的“增长效应”助推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

(二) 技术进步效应：形成特色技术赶超之路，促进“科技大国”崛起

中国在参与国际循环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特色后发国家的技术赶超之路。中国作为一个技术后发国家，经历了初期单纯地引进技术设备来填补技术空白，到 1992 年践行以“市场换技术”思路利用外资促进技术能力提升，再到 21 世纪后的自主创新与跨国企业本地导向研发相结合的技术进步^[2]。

可以说，在参与国际循环的过程中，中国立足比较优势抓住时机，一方面从国际市场进行各类形式的技术购买，积极获取先进的设备、技术与信息，1995—2019 年年均引进国外技术经费保持在接近 400 亿元的标准；另一方面，依靠跨国企业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和技术外溢奠定了技术积累^[3]。在两条路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结合内部知识，重视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并创造出新的技术，实现了技术创新，储备并积累了技术能力，从而有效地提升了中国整体生产率水平^[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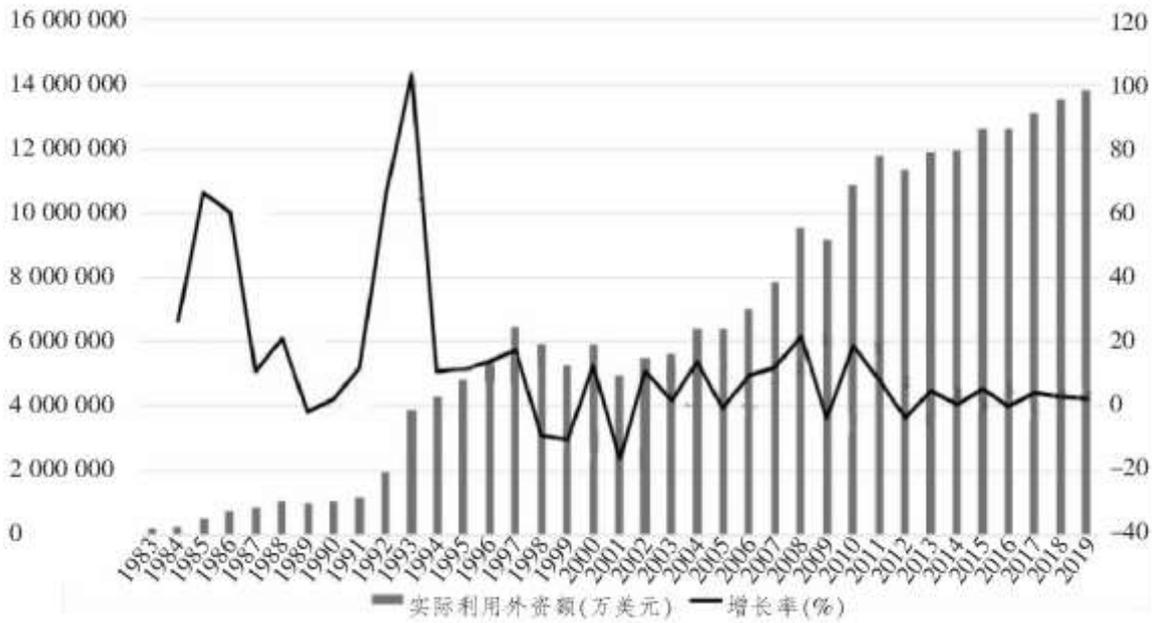


图 3 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及其增长率的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在参与国际循环中，技术引进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自身自主创新能力提升^[5]，其中模仿效应、竞争效应和研发溢出效应均会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水平的提升^[6]。《2020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指数在全球 131 个经济体中位列第 14 名，是唯一进入全球创新指数前 30 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这种显著提升的国家技术能力具体表现在：一是研发支出快速攀升，加速追赶全球科技的领先者。中国从 21 世纪伊始 R&D 强度远低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持续追赶，到 2019 年达到了 2.19%，与欧盟 15 国平均水平接近，追赶技术领先者态势明显。

二是专利数激增，彰显大国科技实力。专利申请是观察一国科研成果商业化的最佳视角，也是衡量一国创新能力的基本指标。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统计，在具有较高含金量的 PCT（国际专利体系）申请中，2019 年中国提交的专利申请量超过美国，跃升至第一位，成为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国际专利申请的来源国。

在全球 PCT 前十大申请公司中，中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连续第三年成为企业申请人第一名。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拥抱全球化的过程中参与国际循环，即基于国际要素流动有效地提升了自身技术水平，实现了创新能力的提升，形成了明显的“技术进步效应”。

（三）价值链攀升效应：推动“中国制造”扬帆出海，重塑全球产业分工格局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参与国际循环助力自身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使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发展成目前世界上现代工业体系最完整的工业国^[7]。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确立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辅之于后发技术的引进、模仿，最大限度地挖掘人口红利和资源要素优势，使得中国制造业主要依靠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加工、组装和制造环节，成为“世界工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8 年中国制造业规模是美国的 1.7 倍、欧盟的 1.6 倍、日本的 3.8 倍，占世界比重达到 28%。

2014 年，中国 220 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2018 年中国诸多产品全球份额遥遥领先，成长成为“全球巨人”。除了产品规模庞大外，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不断升级，1978 年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占到 53.5%，超过了全部出口产品的一半；到 2001 年中国出口工业制成品比重超过了 90%，到 2017 年更是达到了 94.8%。1985 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仅有 2%左右，到 2017 年提高到 28.8%。另外，以出口产品复杂性计算的经济复杂度指数中，2018 年全球经济复杂度指数（ECI）排名中，中国排在第 18 位。与 10 年前相比，中国出口产品变得更加复杂，在 ECI 排名中上升了 6 位（见图 4）。中国制造业规模之大、出口更多样化和复杂化，使得“中国制造”享誉全球。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参与国际循环中，外资制造业企业所带来的学习效应以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8]，改善了各行业的生产率水平，而这恰恰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能够攀升的基础。正是由于参与国际循环，中国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并重塑了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一张张“中国制造”的名片使中国从全球价值链的入门者逐步成长为其中的重要枢纽之一。

世界贸易组织（WTO）与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发布的题为《东亚贸易模式与全球价值链：从货物贸易到任务贸易》的报告指出，21 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伊始，当时中国已经融入亚洲—北美跨洲生产网络。到 2005 年，中国已经成长为亚洲—北美生产网络中间产品的轴心市场。《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2017——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测度与分析》¹也强调中国是全球价值链中三个世界生产中心（美国、亚洲和欧洲）之一的主要枢纽，且有别于其他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长期参与国际循环，依靠标有“中国制造”且物美价廉的最终制成品销往世界各地，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元素”，且有力支撑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形成了“价值链攀升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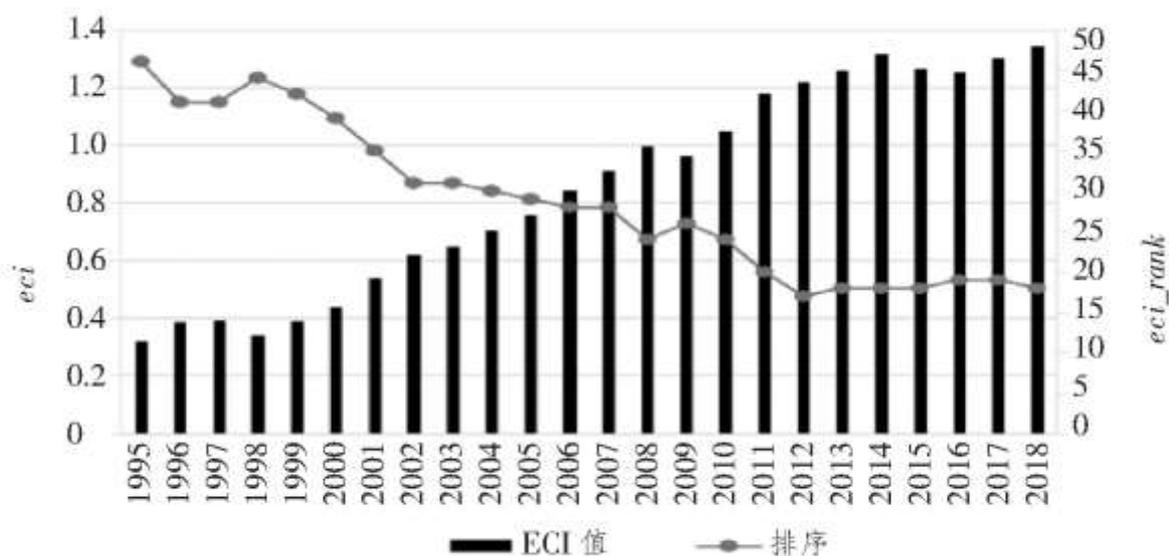


图 4 中国经济复杂度指数及全球排名的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公布的数据整理²

二、新发展阶段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传统模式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逐步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模式，适应了当时国内国际的条件和环境，对中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全球竞争力提升等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世界格局日趋错综复杂，外部环境剧烈变化，使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传统模式面临较大的挑战。

（一）参与国际循环的增长红利在消退，全球格局深刻变化造成对外环境日趋复杂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外贸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呈日趋疲软之势。近些年，中国出口总额和进出口总额的增速逐步放缓，甚至有些年份增速出现负增长，这也导致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在逐渐减弱。从内部环境来看，进入新常态后，传统的要素红利、制度红利和结构红利均在减弱，特别是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各项优势开始弱化。

马飒指出，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开始超过周边几个发展中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出口造成了负面影响^[9]。除此之外，土地以及自然资源约束加剧、环保政策的压力和产业升级倒逼低端制造业转型，均对传统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中国从 2002 年开始实行的出口导向型外贸政策严重偏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导致了生产要素配置的扭曲和对外贸易的粗放式增长，从而使得在新阶段参与国际循环的传统模式所产生的“增长效应”较为有限。

更重要的是，外部环境变得日益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变革的阶段，全球经济陷入“自我低增长循环陷阱”^[10]。全球经济呈现不稳定、低需求、弱复苏的疲软态势，这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过贸易保护主义等方式迫使其供应链“去中国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对中国参与国际循环带来较大挑战。

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主要负责加工配套部分，这导致其议价能力和博弈能力相对较弱，同时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中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供应链的大规模外移可能会使中国制造业出现未强先衰的局面。虽然现代生产网络的复杂性决定了这种强行“脱钩”不可能在短期内大规模发生，但其也预示着中国参与国际循环的传统模式和方式急需调整。

（二）参与国际循环的技术进步效应在减弱，转变传统技术进步方式迫在眉睫

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除了与资本回报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相关外，还与技术进步不足、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放缓有关^[11]。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技术进步，主要源于外资对中国技术外溢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但随着中国与技术领先国的技术差距进一步缩小，传统学习效应在超过临界值后的边际报酬开始递减，加之复杂知识的空间黏性，在此情况下以往“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发展路径容易陷入“低端锁定”与动态跟随陷阱^[12]，其对于中国整体技术进步的作用在逐步降低。

此外，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区块链、生物技术为主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技术后发国家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中国在5G通信、超算技术等一大批新兴技术领域不断突破，由“追随者”向“引领者”转变，在核心技术领域所面临的封锁与打压也越来越严重。面对中美技术差距日益缩小的状况，美国挑起贸易摩擦，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

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是由于中国技术快速追赶导致中美之间技术差距缩小^[13]，从而引起的技术守成国和崛起国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技术守成国敌视并遏制技术崛起国在技术层面的发展和赶超，在一些其优势领域实施技术封锁，企图截断技术崛起国迈向技术前沿的路径。由此可见，中国参与国际循环的传统模式获得的技术进步空间在不断压缩，技术进步方式的转变势在必行。

（三）参与国际循环的价值链攀升效应在逐步丧失，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在加剧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凭借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的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取得了“贸易数量”激增和“贸易质量”提升的双重飞跃。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贸治理体系出现深度调整，中国传统增长模式也逐渐式微。一方面，中国以低成本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但随着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摘取全球价值链“低垂的果实”难以为继^[14]。

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中国制造业企业还存在大而不强、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核心技术缺失等问题，这构成了进一步摘取全球价值链“高悬果实”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之间关系日趋复杂，发达国家推行的“制造业回流”和“再工业化”战略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优势开始崛起，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传统方式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形成“双重冲击”^[15]。

国内外环境的巨变使得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可能陷入“锁定”的风险在加剧。在传统增长模式下，中国凭借资源能源的优势被动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可获得的附加值较为有限，中国出口产品附加值仍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长期从事较低产品附加值的生产，容易形成生产惯性，使得中国出口企业被锁定于低附加值的代加工环节中。

中国过去长期走的“低端嵌入”的全球价值链发展之路，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源能源的低价优势实现规模化扩张，这种模式会由于价值链分工而引致巨大利益^[16]，企业没有足够动力去从事诸如研发等有助于价值链攀升的经营活动，最终有可能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陷入价值链低端锁定^[17]。

除此之外，在中国逐步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时，会遭到发达国家的“俘获”，即发达国家利用其市场优势和技术优势对中国的价值链攀升实行阻截，试图将中国困在微利化、低附加值的价值链低端^[18]。另外，其他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崛起，会使部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具有更低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转移。

三、新发展阶段国内外双循环互动发展模式的构建策略

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传统模式在当下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要求中国进行根本性的调整，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的主动选择、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以及发挥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19]。构建国内外双循环互动发展模式，关键在于形成“内外兼修联动、供需两端发力、改革畅通双循环”的新格局。

（一）对内：促进供需两端联合发力，打造“中国创造+中国市场”的大国新优势

构建国内外双循环互动发展模式首先强调的是“以内为主”，只有以内为主才能真正实现自生能力的构建和自主创新水平的提升，才能推进以内促外，最终实现内外联动。以内为主的战略基点既要求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又要求打造高质量的供给体系。

1. 打造“三链”融合发展的新生态，形成高质量的供给体系

在新时代要寻找新的增长点、形成技术进步新空间以及适应新的内外部环境，关键在于打造“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三链融合发展的新形态，以此作为抓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一，打造创新链。打造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为核心，探索产学研联合体多种模式为支撑的国家系统创新链，构建互动融合、相互促进的双重创新体系。既要促进包括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等知识创新为主体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完善，又要支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向更高层次发展。打造系统创新链，核心在于要让创新链成为产业链、供应链等各链条的有力支撑，真正让创新驱动贯穿始终。

第二，提升产业链。要畅通产业链的大动脉和微循环，打破部分行业政策性梗阻，打通关键堵点，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和经济社会循环；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要顺应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大趋势，建立共性技术平台，解决关键共性技术问题，通过关键共性技术的产业化带动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增强产业链的韧性。

第三，再造供应链。以数字化为供应链再造的发展方向，探索“工业互联网+供应链业态”协同发展的新模式，促进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总之，要以创新为引领，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抓手，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三链”融合发展，铸基“中国创造”。

2. 重视民众的民生福祉，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构筑完整的国内需求体系

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基点既有供给端又有需求端，内需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支撑。构建国内外双循环互动发展模式，形成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新格局，关键在于培育完整的国内需求体系。完整的内需体系涉及居民、企业和政府三大主体。

就居民需求而言，需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中低收入群体规模，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同时，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助力形成良好预期，刺激居民即期消费。在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之外，要健全促进居民充分就业和创业的制度条件，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畅通就业信息，促进就业机会公平，让劳动者在平等竞争中获得合理报酬；建立高效透明的劳动力市场，强化职业培训和再培训，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多措并举助力劳动者创业，为创业者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系统的政策保障。

就企业需求而言，应助力企业抓住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机遇期加速布局，并加快转型升级，打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推进市场化营商环境的形成，精准服务，拓展全周期的服务链条，构建“清”“新”政商关系；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就政府需求而言，应持续转变政府职能，发挥政府支出在扩大内需方面的作用，提升政府在新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重大科技进步方面的全方位需求；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发挥“有为政府”对“高效市场”的支撑作用，让中国 14 亿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中国市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比较优势和发展韧性所在。

3. 促进区域有序协同发展，形成国内大循环的“立体”支撑体系

构建国内外双循环互动发展模式的空间支撑体系，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即推动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进而形成优势互补、分工有序的区域经济布局 and 区域良性发展机制。

第一，科学谋划，根据不同区域发展特点细化并实施区域发展政策，减少区域之间利益冲突，明确区域定位。西部地区应强化深度开发模式，东北地区应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探索新发展模式，中部地区应发挥承接东部、沟通西部的地缘优势，东部地区应持续发挥区域发展“领头雁”作用辐射中西部。要优化各区域分工格局，形成错落发展、有所侧重的区域发展新格局来支撑“内循环”的顺利展开。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发挥以发展城市群、都市圈为重点方向的新型城镇化联通需求和供给循环的枢纽作用。形成多中心、网络化与多层嵌套的城市体系，在城市立体体系中，一方面，强调核心城市集聚创新要素的优势，发挥其在形成发展新动能、辐射带动其他城市发展的龙头作用；另一方面，不同层次城市间需要优化生产力布局，实现城市群产业联动发展。

将都市圈作为生产组织的主形态，在城市间形成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链接，形成支撑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动力。除此之外，还应释放城乡融合的发展潜力，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支持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建设，通过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充分挖掘乡村多元功能，为畅通内循环提供制度红利和结构红利。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发展新格局，是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扩大内需的基础，是促进内循环顺畅流动和各类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空间支撑。

（二）对外：清醒认识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主导更高层次开放合作新格局

构建国内外双循环互动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形成内外联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这段话深刻阐释了国内外双循环互动发展的关键所在。新发展格局不只是强大的内循环，内循环也不是封闭循环。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是应对危机的必然选择，也是参与更高层次国际大循环的战略要求。

1. 扮演好大国角色，逐步从国际循环的“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

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最出色的赶超者和直接获益者。当部分发达国家推行逆全球化措施和破坏全球供应链时，中国应该立足成为全球化的捍卫者^[20]。在新一轮全球化中，中国应该以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地位，承担新时代的大国担当，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在全球治理中提升话语权，积极参与世界经济贸易规则的改革，引领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受惠的国际贸易新格局。

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重构包容新兴经济体利益的全球价值链新体系。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通达体系建设，以这一区域价值链体系的构建来渗透和革新传统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改写“中心—外围”的国际贸易旧式规则。同时，还应创新和探索各国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内部的合作模式与合作理念，鼓励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让全球更多国家形成战略互信、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国际新关系。

2. 积极融入并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构建多元化安全的供应链体系

中国作为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国家，目前在高铁、电力、机械、造船、家电、轻纺等行业已具备产业链的优势，下一步的重点是保持优势并进行强化提升，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技术提升工程，以加强和巩固国际领先地位，稳住国际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通畅。

更重要的是，要顺应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潮流，对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链抓紧布局，力求突破，抢占全球制高点，并以此作为重塑全球产业链的“突破口”，助力中国企业把握机会向产业链中高端升级，抢占“微笑曲线”的两端。中国供应链在新冠肺炎疫情和“逆全球化”的影响下面临严峻考验，虽然现代供应链越来越长，但再长也有个终点。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有稳定供应链的底气。一方面，要打造多元化的供应链体系，进一步巩固日韩、东盟供应链联系，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中亚诸国、东欧各国打造“中国+N”的供应链，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将更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纳入其中；另一方面，要将供应链的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与相关国家建立“供应链安全体”，形成国家间信任合作共赢的供应链体系，从而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中掌握主动权和先发优势。总体来说，中国应抓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战略窗口期，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和黏性，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塑中充分释放“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能量。

3. 做好新时代的开放发展工作，更高效地利用“两个市场”，促进“两个循环”

在新时代中国迈入开放发展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中国要将外贸提质增效作为发展目标，着力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努力实现外贸由量到质的跨越，在贸易强国的征途上加速前进。

一方面，促进贸易方式更趋合理，贸易结构更加高级化、多元化，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从财税金融支持、贸易业态和提升通关便利度等方面实施稳外贸稳外资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鼓励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向世界输出中国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产能和品质卓越的创造水平，通过企业间的合作互动引进中国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和要素，促进进口与出口、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双重平衡。

更重要的是，新时代的开放发展更加强调对外开放与对内发展的相互促进和联动。传统的瞄准国外市场、依靠西方市场的发展战略正在完结，新时代需要强调以内为主，只有对内改革，坚定修炼“内功”才能激发发展活力，形成发展动力，从而形成对外开放的有力支撑。此外，还必须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深入主导和参与国际新循环，这样才能倒逼对内的诸多深层次改革和蜕变。新时代既需要重视国外市场，又需要重视国内市场，利用好两种资源，实现内外兼修联动，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江小涓. 新中国对外开放 70 年：赋能增长与改革[J]. 管理世界, 2019(12):1-16.

[2]黄烨菁. 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J]. 世界经济研究, 2008(6):14-18.

-
- [3]江小涓. 吸引外资对中国产业技术进步和研发能力提升的影响[J]. 国际经济评论, 2004(2):13-18.
- [4]吴延兵. 自主研发、技术引进与生产率——基于中国地区工业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08(8):51-64.
- [5]CHANG C, ROBIN S. Doing R&D and/or importing technologies: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firm size in Taiwan'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06, 29(3):253-278.
- [6]唐未兵, 傅元海, 王展祥. 技术创新、技术引进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 经济研究, 2014(7):31-43.
- [7]勃兰特, 罗斯基. 中国的伟大经济转型[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8]余东华, 田双. 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理[J]. 改革, 2019(3):50-60.
- [9]马飒. 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了中国出口优势吗——基于不同贸易方式和地区的比较研究[J]. 财贸研究, 2015(4):47-56.
- [10]盛垒. 疲弱复苏的世界经济: 新变量, 新趋势与新周期——2017年世界经济分析报告[J]. 世界经济研究, 2017(1):3-17.
- [11]封永刚, 蒋雨彤, 彭珏.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分解: 有偏技术进步与要素投入增长[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7(9):39-56.
- [12]魏婕, 安同良.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创新驱动[J]. 中国科技论坛, 2020(1):33-40.
- [13]杨飞, 孙文远, 程瑶. 技术赶超是否引发中美贸易摩擦[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10):99-117.
- [14]刘梦, 戴翔. 中国制造业能否摘取全球价值链“高悬的果实”[J]. 经济学家, 2018(9):51-58.
- [15]朱晓乐, 黄汉权. 全球价值链的演变及其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J]. 改革, 2021(4):60-67.
- [16]裴长洪, 郑文. 中国制成品出口规模的理论分析: 1985-2030[J]. 经济研究, 2012(11):18-33.
- [17]牛志伟, 邹昭晞, 卫平东.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变化与中国产业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选择[J]. 改革, 2020(12):28-47.
- [18]孙志燕, 郑江淮. 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与“功能分工陷阱”的跨越[J]. 改革, 2020(10):63-72.
- [19]刘鹤.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N]. 人民日报, 2020-11-25(006).
- [20]蔡昉. 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注释:

1 《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2017——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测度与分析》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全球化智库 (CCG) 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 2017 年联合发布。

2 世界各国的经济复杂度 (Economic Complexity Index, ECI), 主要以国家出口产品的复杂度来衡量。Hausman 和 Hidalgo 及其团队在哈佛大学开发了交互性可视化的“云图 (Atlas)”网站 (<https://atlas.cid.harvard.edu>), 提供了不同年份各国的产业位置, 丰富了发展经济学中有关测度国家能力的理论。